

宗教因素对土耳其入盟前景影响浅析^{*}

钮 松

内容提要 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道路历经数十载但前景仍不明朗,人们对其入盟受阻之因多有揣测。随着冷战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以“9·11”为标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活动的兴起,人们愈发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间业已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宗教冲突问题,这也波及对土耳其入盟历程的认识。土耳其与欧盟在“去宗教化”的世俗属性上、保障个人宗教信仰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对于土国入盟有着积极的意义,双方仅仅在温和宗教政党遵循民主与世俗原则的参政问题上存在着一些分歧。从总体上看,所谓宗教因素不构成土国入盟受阻之主因,其本质影响因素是土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问题。

关键词 土耳其 欧盟 宗教因素 伊斯兰教 基督教 经济发展

土耳其(1919—1923年)在凯末尔主义的旗帜下走上了一条“脱亚入欧”的新路,旨在彻底摆脱奥斯曼帝国带给土耳其的“病夫”形象,以期实现民族和国家的振兴。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因长期以来主要与西方世界的密切交往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欧洲国家”,并因其积贫积弱的形象而被称为“欧洲病夫”,因此凯末尔的“脱亚入欧”战略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积淀和基础。土耳其在凯末尔领导下从文化和政治上以欧洲化为目标,各项激烈的改革措施旨在与伊斯兰世界完全决裂。虽然近年来土耳其的外交开始较多地关注中东事务,但欧洲外交仍是其考虑重点,谋求加入欧盟仍是土耳其政府的目标。

二战后,由法、德联合基础上的煤钢联营发展而来的欧洲联盟影响巨大,土耳其一面继续着其“脱亚”历程(尽管与凯末尔时代有着很大的变化),一面继续着其“入欧”历程,而“入欧”的标志便是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土耳其在20世纪60年代便与欧共体联系紧密,并于1987年首次正式提出了入盟(时为欧共体)申请,但直至1999年才被确定为入盟候选国,10余年后的今天,土耳其的入盟前景仍不明朗。而与西欧在两极格局下对抗数十年的东欧国家及少数原苏联成员国却早于土耳其加入欧盟,这些事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诸多舆论,其中最为主要的观点便是土耳其挥之不去的伊斯兰身份影响了其未来的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获得,换言之,宗教因素影响了“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加入“基督徒俱乐部”的欧盟。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俱乐部”实则与“基督教俱乐部”并不等同,欧盟是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之欧洲国家的聚合,其公民多为基督徒,但其制度建设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宗教色彩,它只是欧洲经济与政治的一种集合体。土耳其内部似乎也对自身入盟前景抱有宗教上的疑虑,土国总理埃尔多安于2009年5月访问波兰时曾明确指出“没有土耳其,欧盟只是一个基督徒俱乐部”,“问题在于,许多国家一周之内便加入了欧盟,但土耳其的成员国身份却被延迟多年”。^①正是带着这一疑问,本文将对宗教因素是否是土耳其入盟进程遭遇停滞不前的最根本

^{*} 本文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冷战后大国中东安全战略比较研究)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的资助。

^① Trend News Agency, “Without Turkey, EU is Christian Club: Turkish Prime Minister”, *Journal of Turkish Weekly*, May 15, 2009.

原因进行细致的考察。

一、欧洲的“去宗教化”与欧盟的宗教政策

欧盟的建设与发展主要依托于欧洲国家 欧洲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路径。欧洲地区原本并无基督教背景 早期的“欧洲”甚至并无今日基督教文化背景之欧洲的含义 随着 313 年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宣布信仰自由并在其晚年受洗入教 直至 390 年狄奥多西一世正式确立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 这个源于迦南的宗教在欧洲大陆开始成为主导。随着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 欧洲逐渐基督教化,一个“基督教的欧洲”开始诞生 这种一神论的宗教利于破除各地区间的藩篱与隔阂而实现一统,于是新的欧洲基督教民族开始产生 正如意大利的恩佐·法里内拉(Enzo Farinella)所指出的“大陆的历史和我们的文化可在基督教中找到其内在根源 这开展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并且是文明中的强大因素”,“基督教信仰塑造了大陆文化,成为我们历史的基本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准则和体系,基督教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我们文明过去 2000 年的基石”。^① 欧洲自此开始具备强烈的宗教边界,此时的“欧洲”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宗教概念。人类的区隔从边界开始,既有土地的边界也有心灵的边界,这两种边界彼此塑造。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对欧洲的冲击,这两种同源的一神论宗教彼此区分,并由此衍生出思想与武力的碰撞,欧洲与阿拉伯帝国及随后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经历了长期的相互圣战与征伐,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的征讨及对欧洲的劫掠对于欧洲人而言更是一场噩梦。“地理欧洲”与“宗教欧洲”在这一时期存在着一定的交集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朦胧的东、西方概念开始出现,“西方被视为处在基督教世界历史的形成之中,但基督教世界仅限于欧洲” 欧洲“被从根源上追溯到基督教的 T/O 地图,此时欧洲等同于西方的基督教和雅弗之地”。^②

发生于 14—17 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含蓄地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文精神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在基督教时代的欧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地理概念上的欧洲(地球不是平的且不止亚、非、欧三洲)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人们重新认识基督教的运动,宗教改革便在此情形下应运而生了。欧洲的宗教改革并非抛弃基督教,而是回到基督教的本来教义,其矛头直指僵化的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和腐败的教士。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信仰问题。马丁·路德根据《圣经》经文发展出“因信称义”的学说,即信徒因为信仰而直接面对上帝,抛开了教士的中介作用。二是教权与政权的关系问题。罗马教皇超越欧洲世俗君王的权限大大减少,改宗新教的欧洲国家君王在世俗权力上不再臣服于教皇,在宗教权限上成为本国教会的至高首脑,在新教国家内君权实际上高于教权,如英国 1534 年的《至尊法案》就宣布“国王陛下合法且理所当然的是且应该是英格兰教会的至高首脑”。^③ 宗教改革一举冲破教权对于欧洲长期的政治束缚以及僵化的神学思想对人们思想的禁锢:首先,在宗教上,新教国家乃至日后天主教国家都实现了教权与政权的脱钩,“欧洲”逐渐从基督教的宗教欧洲向有基督教背景的文明、文化欧洲转变,这种文明、文化欧洲在今日便是拥有民主、自由价值观念国家聚合之欧洲;其次,在神学思想上,回归个

^① Enzo Farinella, “Rediscovery of Values: A Challenge of Our World”, http://ec.europa.eu/ireland/press_office/events_ireland/enzo50.doc.

^② Walter D. Mignolo, *Coloniality, Subaltern Knowledge, and Border Think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80. 中世纪的欧洲人结合当时的地理学与宗教知识,绘制出了 T/O 地图,其绘制思想基于当时欧洲人对于地球的认识:地球是平的,陆地分为三大洲,分割此三洲的河流和海洋呈“T”形,而陆地被“O”形的海洋所包围,因而这种地图被称为 T/O 地图。在中世纪欧洲的 T/O 地图中,世界分为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欧洲,分别对应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的土地。

^③ “Act of Supremacy”, 1534, <http://www.britainexpress.com/History/tudor/supremacy-henry-text.htm>.

人信仰与自由的基督教思想转而演进为一种探索、进取、公益、慈善和重视科学的精神,这促进了欧洲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也为1500年左右以来欧洲开创的西方全球时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地理欧洲”到“宗教欧洲”,再到“文明、文化欧洲”,欧洲从非宗教化转而宗教化,进而实现了“去宗教化”。“以君主国、民族国家为起点的欧洲走向了世俗化,今日欧洲国家主要是有基督教传统的世俗国家。”^①这种“去宗教化”的“文明、文化欧洲”实际上契合了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所提出的“宗教的终结”理论。“宗教”一词并非是从来就有的,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其发源本身并非宗教,而是一种思想与信仰的体系,耶稣基督和伊斯兰本身都不是宗教,耶稣基督是上帝派到人间的先知与救世主,伊斯兰本身意味着“和平”与“顺从”,《古兰经》经文提供了具体的佐证:“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作为你们的宗教”。^②可见,神圣的恩典与经典赐予人类之后,蒙上帝的眷顾,这种体系才发展为宗教,并随着与社会生活的结合而趋于神圣化和仪式化。正因为“宗教”一词带给人们的种种误解,史密斯在对“宗教”的起源与发展进行梳理与分析之后,提出要放弃“宗教”的概念,转而将其在“积累的传统”与“个人的信仰”之下进行考察。^③今日欧洲就处在“去宗教化”的同时传承了基督教留给欧洲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后历史”的欧洲得到飞跃和升华,基督教信仰退回个人生活领域,而教会以及宗教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则在世俗国家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欧盟的诞生正是根植于“去宗教化”的欧洲土壤。

欧盟的产生源于通过非战争的经贸合作、经济一体化的方式来解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并逐步从非战争的共同体向和平的共同体过渡。欧盟在法、德的煤钢联营开创之时对于成员国的身份并无特殊要求,随后其在西欧的扩张主要从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的角度考虑,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政治意识形态分歧下的经济模式差异,首先拒绝与西欧国家进行经贸合作,苏联主导的封闭的“经济互助委员会”^④便是例证。随着1989年前后许多原苏东国家的转型并申请加入欧盟,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的认同便成为入盟必不可缺的两个重大因素和标准。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哥本哈根标准”为“在政治上,有确保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尊重和保护少数族群的稳定机制;在经济上,有发挥作用之市场经济的存在以及在联盟内部有处理竞争压力和市场力量的能力;接受已有之共同体:承担成员国义务的能力,包括遵守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⑤不难看出,“哥本哈根标准”并未提及任何宗教属性或文化属性的标准,也就是说,欧盟对成员国并无特定之宗教属性或者文化属性的要求。也正因如此,2004年7月21日,土耳其驻荷兰大使塔坎·艾登(Tacan Ildem)声称“当一个国家获得候选国地位之后,只有哥本哈根政治标准应被用来决定是否允许该国家开始谈判。这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关于土耳其是否符合欧盟的宗教方面、文化方面或地理方面的争论是不着边际的,因为土耳其已被赋予了候选国地位”。^⑥不可否认的是,在“文明、文化欧洲”土壤中的欧盟仍旧承继了基督教文明的遗产,但作为经济与政治联盟的欧盟淡化或回避了这种属性。欧洲人在欧洲的“去宗教化”的身份上不存在分歧,但对于欧盟“在其宪政化进程之中,欧洲的基督教遗产

① 钮松《欧美在中东民主治理上的分歧与合作》,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4期,第29页。

② 《古兰经》(5:3)。本文所言《古兰经》皆为马坚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详见 Wilfred Cantwell Smith, *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 Fortress Press, 1991.

④ 该组织由苏联牵头于1949年1月成立,旨在与西方的“马歇尔计划”进行对抗。该组织于1988年与欧共体签署相互承认并建立联系的联合声明。随着东欧剧变,该组织于1991年6月解散。

⑤ “Accession Criteria (Copenhagen Criteria)”, http://europa.eu/scadplus/glossary/accession_criteria_copenhagen_en.htm.

⑥ Joy Sie Chueng, “Does Turkey belongs to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view with Mr. Ildem, Ambassador of Turkey”, *Rostra Economica*, October 2004, pp. 11 - 12.

或确实与上帝的关联是否应该在其序言中提及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① 尽管如此 2004年签署的《欧盟宪法条约》仍将基督教文明和文化属性排斥在外。

虽然欧盟回避自身建设过程中的宗教文明属性问题,但在一些文件中具体阐述了其宗教政策和文明交流、对话的政策,如欧盟在《欧盟年度人权报告(2008年)》中便阐述了欧盟以人权为核心的民主观涵盖的主要选项,其中就包括“宗教与信仰自由”和“跨文化对话”:(1)在“宗教与信仰自由”方面,“欧盟通过意见书和公开声明来表达其对于宗教自由及相关宽容和歧视的关注”,“欧盟已强调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歧视是一种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应在其所有方面进行强调;应认识到这既不限于任何一种宗教或信仰,也不限于世界的任何部分;并且对宗教少数派别信徒权利的保护是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核心”。(2)在“跨文化对话”方面,“欧盟坚决承诺促进欧盟内部以及与第三世界国家间的跨文化对话”,“所有欧盟国家及欧盟委员会支持文明联盟”,“此联盟在2005年岁末由西班牙和土耳其总理及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共同倡导,旨在提升跨文化与跨宗教的国家及民众间的了解与合作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帮助打击诱发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的势力”。^② 欧盟从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到提倡宗教文明、文化间的对话显示了其承接欧洲“去宗教化”的身份,将宗教剥离于政权的同时保护民众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保护各宗教文明长期积累下来的文化传统,这便是欧洲“去宗教化”转向“文明文化欧洲”的实质和欧盟宗教政策的实质,欧盟并无基督教化的倾向,也更无反伊斯兰教的倾向,欧盟与其他国家,如与入盟候选国土耳其之间并无约瑟夫·利伯曼所言的“神学铁幕”的阻隔,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着“神学铁幕”。^③ 面对欧盟内部的穆斯林群体问题,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说的一段话有助于理解欧洲的“去宗教化”和欧盟的宗教政策,他指出“当法国人谈论法国的犹太人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那些到犹太会堂去做礼拜的犹太人,而是指那些从一种比宗教文化更文化的特性中辨别其他特征的犹太人。那好吧,我的‘穆斯林’用语也是这样,它丝毫不是要把任何人关进清真寺,而是给法国同胞中那些以伊斯兰教为其部分特性的人取一个名字。”^④

二、土耳其的世俗国家属性及其伊斯兰教政策

本文旨在考察宗教因素是否是影响土耳其入盟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在对欧洲的身份以及欧盟的宗教政策依次进行梳理和综合分析之后,对土耳其的国家属性及其宗教政策的考察便显得尤为重要。土耳其是否具备世俗化的国家属性决定了该国能否与“去宗教化”的世俗化的“文明文化欧洲”相容,土耳其对于自身的伊斯兰教政策是否符合欧盟对于成员国的要求乃至非成员国的期待,对于其入盟进程的影响则更为直接。

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看来,土耳其过于开放,阿富汗塔利班又过于保守。土耳其的过于开放既指其对西方的开放程度之高,也指其世俗化时间之长和程度之深。被认为持保守主义思想的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也承认,“欧洲和土耳其皆有世俗政府”,^⑤ 此评价极为妥贴。现代土耳其人源

^① Tomas Christiansen, “Constitutionalising the European Union, Constructing EU Borders”, in Christopher S. Browning (ed.), *Remaking Europe in the Margins: Northern Europe after Enlargements*, Ashgate Publishing, 2005, p. 81.

^②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nual Report on Human Rights 2008”, Brussels, November 27, 2008,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Upload/st14146-re02-en08.pdf>.

^③ Joseph Lieberman, “The Theological Iron Curtain: A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for Engaging the Muslim World”,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3.

^④ (法)尼古拉·萨科奇著、曹松豪译《见证——萨科奇自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

^⑤ Madeleine Albright, *The Mighty and the Almighty: Reflections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 Harper Collins, 2006, p. 247.

于古代的突厥人,而突厥人起源于蒙古高原,曾在中亚地区建立过突厥人国家,在与阿拉伯帝国的交往之中于7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突厥人在13世纪迁居小亚细亚,并于1293年独立建国,1324年正式称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随后征服了中欧和东欧大片地区,并于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灭亡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在15世纪和16世纪先后征服波斯尼亚、克里米亚、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并灭亡了埃及马木鲁克王朝。随着对麦加和麦地那的占领,奥斯曼帝国苏丹获得“两圣城仆人”称号。奥斯曼帝国早期并不关心哈里发头衔,只是立伊斯兰教为国教。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苏丹开始采用哈里发的称号并身兼哈里发,旨在加强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并树立其在穆斯林世界的精神领袖地位。尽管此时奥斯曼帝国外表上呈政教合一的形式,但其君权远高于象征性的教权,直至20世纪初,原本更多地倾向于世俗化的奥斯曼苏丹为对抗欧洲强国以免遭灭亡,而迎合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āl ad-Dīn al-Afghānī)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这与海湾战争后世俗化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开始放弃对宗教的压制,转而以将国家部分宗教化的方式来对抗西方并维持萨达姆政权的生存极为类似。从发展史看,奥斯曼帝国有着伊斯兰教的外壳但并无欧洲宗教改革之前的那种“宗教化欧洲”的历程,这从奥斯曼帝国对于境内各种宗教和教派的相对宽容可见一斑。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脱胎于一战后摇摇欲坠的“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20世纪20年代凯末尔革命的顺利开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奥斯曼帝国实质上的世俗化本质,只是更进了一步。凯末尔革命后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在完全世俗化的基础之上,该国《宪法》第一部分“总则”的第2条“共和国的特性”便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以法治来治理的、民主的、世俗的和社会的国家”,其第4条则更进一步确保了土耳其的国家性质,即宪法第2条和第1条、第3条的条款均“既不可修改,也不得对它们提出修改”。^①凯末尔在执政初期容忍了伊斯兰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国教的地位,但他更多地是通过这种革命的暂时妥协将其限于一种象征意义而已,如他称“哈里发只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宗教领袖,并无实权和地位”。^②经过几年的缓冲,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924年3月3日正式废除了哈里发制度,这项举措不仅将教权的最后一丝象征意义也消除殆尽,而且利于放弃对于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宗教责任与义务。土耳其于1928年从宪法中删除了“国教”的所有条款,这就彻底将伊斯兰教从宗教本身到其教士排斥在政权之外。废除了伊斯兰哈里发和土耳其国教的土耳其共和国从此成为一个完全的世俗国家,而西方化则是其更进一步的目标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一般而言,弱势的一方往往被动转向或主动选择强势一方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改宗往往体现在宗教占主导的国家与社会中,如突厥人在7世纪改宗阿拉伯帝国信仰的伊斯兰教便是明证。这种弱势与强势不仅仅指军事方面,有时也体现在文化文明方面,如在中国这个非宗教化的国度里,文化弱势的满族统治者通过军事征服之后仍旧迎合文化强势的汉族,甚至放弃自身的对萨满教的信仰而改宗佛教,但这种意义并不如在宗教改革前的欧洲明显。正是由于欧洲的“去宗教化”,因而凯末尔“全盘西化”的“脱亚入欧”政策没有对“去宗教化”之前的欧洲宗教属性的临摹与改宗的必要,欧洲的“去宗教化”为土耳其的完全世俗化提供了标杆和方向。

在凯末尔看来,伊斯兰教是导致强盛的奥斯曼帝国走向腐朽与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救亡图存的革命成为了凯末尔解决伊斯兰教问题的最佳时机和理由。尽管伊斯兰教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伊斯兰教的宗教改革即“赛莱菲耶”^③思潮的洗礼,但其声势和深度远不如欧洲的宗教改革,尤为重要,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伊斯兰世界并未有过如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的运动,因而伊斯兰教

①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http://www.tbmm.gov.tr/anayasa/constitution.htm>.

② Maryam Jameelah, *Islam and Modernism*, Mohammad Yusuf Khan, 1968, p. 115.

③ “赛莱菲耶”是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先辈、先贤”,“赛莱菲耶”思潮指回归伊斯兰教本源、净化教义和教规、革新伊斯兰教的运动。

日趋保守。在此环境下,凯末尔在取消伊斯兰教教权后,主要从削弱伊斯兰教文化影响及最大限度减少“积累的传统”入手,这样,“属于大部分人的伊斯兰教文化被剥夺了领导地位”。^①凯末尔对于伊斯兰文化的抑制主要是为了与伊斯兰传统文化浓厚的中东伊斯兰国家进行割裂,进而塑造一种属于欧洲的伊斯兰文化。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凯末尔对具体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与习俗进行了限制或摧毁:他下令禁止传统的礼拜帽而改行西式礼帽和鸭舌帽,禁止政府官员穿着传统服饰而改穿西装;对留有穆斯林传统大胡须者课以很重的胡须税;强制以土耳其语而非阿拉伯语作为礼拜宣礼用语,且将土耳其语文字从阿拉伯文向拉丁文的书写转变(意义最为深远)。

尽管土耳其早期存在着激进的欧洲化与世俗化政策,但土耳其共和国的宗教政策遵循的一条主线是:一方面,保护信众对于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个人信仰;另一方面,绝不允许宗教势力以任何形式的宗教团体或者政治团体参与政治或干涉政治。对于前者,凯末尔改变的是伊斯兰教传统文化习俗而非改变民众的个人宗教信仰,“如杰弗逊一样,凯末尔·阿塔图克坚信笃信、表达及交流宗教信仰的个人自由”。^②对于后者,土耳其政府不仅对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打击,而且长期以来对于有宗教背景的政党的参政行为予以及时而坚决的取缔。二战之前,土耳其政府的高压政策使得伊斯兰极端势力没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二战后随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多党制选举的实施,社会多元化的空间为宗教极端势力和宗教政党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宗教极端势力旨在颠覆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道路,到20世纪70年代其暴力活动愈演愈烈,直至土耳其军方在1980年接管政权以确保国家的世俗化方向。与此同时,土耳其事隔数十年在学校开设义务性的宗教课程以培养对伊斯兰的正确理解,这其实符合凯末尔的本意,“他并非反伊斯兰,而是视‘真正的伊斯兰’是一种理性和自然的宗教”。^③面对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9·11”之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复兴,土耳其加大了打击力度,但也面临着如何区分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政党的问题,因为一些具有暴力手段的极端势力有时冠以政党的名号,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同时,是否完全不允许伊斯兰教背景政党的参政,对于土耳其政府而言也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和探索,从多次取缔美德党等政党到对正义与发展党的相对宽容便是例证。

三、影响土耳其入盟前景中的宗教因素及本质因素分析

从对欧洲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属性分析到对欧盟和土耳其的宗教政策的考察,不难发现,笼统言及宗教因素对土耳其入盟前景的影响是不精确的。严格来讲,这种宗教因素的影响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土耳其共和国与欧盟是否在“去宗教化”与世俗化的属性上有一致性;二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宗教政策是否符合欧盟对成员国的相关要求。

关于第一个层面,土耳其共和国与欧盟都是建立在对教权与政权进行剥离的世俗国家的基础之上,世俗国家和政权之间不会产生一种相互对抗与排斥的“神学铁幕”,从这一点看,土耳其与欧盟之间存在着身份的一致性,“去宗教化”的世俗化有利于土耳其的入盟进程。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去宗教化”的世俗化并非排斥宗教文明文化本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积累的传统”,正因如此,世俗化的欧洲和欧盟仍被视为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和传统的国家或组织,土耳其仍被视为有伊斯兰教文化背景和传统的国家,不同类型的文明、文化之间会有碰撞,但在欧盟与土耳其之间的文明、文化碰撞常被误认为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碰撞。其实从欧洲和欧盟内

① Jorgen S. Nielsen, *Towards a European Islam*,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p. 22.

② Garrett Ward Sheldon, *Jefferson and Atatürk: Political Philosophies*, Peter Lang Pub Inc., 2000, p. 57.

③ The Netherland 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 Policy, *The European Union, Turkey and Isl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7.

部来讲,由于长期的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交往,许多中东、北非穆斯林移民长时间在欧洲世代生活和繁衍,他们早已是欧洲的一部分,伊斯兰教业已成为欧洲的第二大宗教,甚至许多本土欧洲人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如2009年德国穆斯林总数接近40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5%左右;穆斯林中土耳其裔占63.2%,东南欧裔的占到了13.6%。^①除了一部分穆斯林因受中东国际关系以及在所在国日益被边缘化的影响而诉诸伊斯兰极端主义外,如2004年西班牙“3·11”恐怖袭击和2005年伦敦地铁大爆炸便是例证,当地绝大部分穆斯林并不存在所谓的宗教冲突或文明冲突。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并非主流,对于国家政治以及伊斯兰教主流势力并无影响。总而言之,土耳其政府与欧盟并无宗教上之冲突,也不存在着不同宗教文明、文化之间的绝对碰撞,即使有着一定的碰撞也是“积累的传统”的影响使然,而非宗教问题。因此,宗教因素在这一层面上不构成对土耳其入盟之路的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与欧盟并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前者意图加入后者本身说明了这一点,一位西方学者与一位土耳其学者合著的文章就认为,土耳其“加入西方主导的价值和制度体系的资格总是处在西方国家的缓慢制约之中”,“在西方学者看来……土耳其问题,与其说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在谋求加入‘基督教俱乐部’——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还不如说是其藐视西方价值观的危险行为”。^②至于土耳其是否藐视西方价值观虽然值得商榷,但价值观背后无疑仍旧是有着宗教或者宗教文化背景。关于这一点,朱威烈教授给予笔者较大启发,他谈及国际关系理论时认为,西方与中东的国际关系思想均体现出不同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的背后分别有着深层次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背景。所谓“藐视”价值观实则反映了欧洲人对于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文化的某种排斥心理,这种排斥以价值观的面貌出现,尽管欧洲很清楚土耳其人十分赞同西方价值观念。

关于第二个层面。首先,土耳其的宗教政策在保障公民个人宗教信仰上符合欧盟的要求。由于土耳其本身是一个世俗化的民主共和国,其对于民众的各种宗教信仰并无特殊限制或歧视。从历史上看,土耳其对于穆斯林礼拜帽和头巾等方面的限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特殊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所宽松。但从实质上看,这并非是一种对于伊斯兰教的“矫枉过正”,因为在土耳其政府看来,在公共场合过分地表达个人宗教信仰是不恰当的,穆斯林的服饰和宗教器物便是典型。21世纪的今天,欧盟许多国家也面临着同样问题和思路,如法国就禁止学生在公立学校里戴头巾或者其他宗教饰物。2004年法国正式通过法案禁止在公立学校穿戴“炫耀性的”宗教服饰,包括伊斯兰教头巾、犹太教无边小帽、锡克教头巾以及较大的基督教十字架等,此项法案牵涉1200万儿童,“此项禁令旨在维护法国严格地将国家与宗教分离的传统”。^③法国的做法与同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英国和北欧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法国对于宗教自由的保障。欧盟本身对于这些具体做法并无明确的支持或者反对,由于有法国的案例,土耳其政府对于宗教服饰等方面在公共空间的限制并不会导致欧盟以及欧盟国家对其产生负面看法。不仅如此,欧洲人权法院在2004年6月的一项裁决中,支持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禁止学生身着头巾和长袍的决定,驳回了该校一名因着装而遭校规处罚的女生的上诉,认为这并未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宗教自由及平等的原则。^④其次,土耳其的宗教政策中关于伊斯兰教背景政党的参政问题最为引起其国内和欧盟的关

① German Information Center, “Germany’s Muslim Community Larger than Thought”, June 25, 2009, http://www.german-info.com/press_shownews.php?pid=1260.

② (澳)露西塔·蒂罗丝,〔土〕纳迪尔·伊尔梅兹著,杨明星译《从土中关系看中国的中东政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5期,第71页。

③ “French Scarf Ban Comes into Force”, *BBC News*, September 4, 2004.

④ K. Gajendra Singh, “Ban on Headscarves and Turkey”, *Turkish Daily News*, September 21, 2004.

注 欧盟国家并不禁止按照现代政党原则组建的有宗教背景的政党在民主与世俗的框架内参与政党政治。欧洲在二战之前便有了各种基督教组织并相互间进行合作,二战后它们积极推动欧洲联合,并于1965年成立欧洲基督教民主联盟,积极推进西欧一体化进程。1976年,欧洲最大的跨国政党欧洲人民党(EPP)成立,该党具有基督教背景,“在政坛上中间偏右,其根源深扎于欧洲大陆的历史和文明,且从一开始就有引导欧洲的计划”,其由38个国家的74个同类政党组成。^①不难看出,欧洲的宗教政党深谙民主与世俗的原则来参与所在国及欧盟政治,这与欧洲所经历的意义深远的宗教改革不无关联。土耳其作为一个具有深厚伊斯兰教文明背景的世俗国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复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长期以来对于有宗教背景的政党保持戒心,稍有“不当”言行即予以取缔,其领导人也常身陷囹圄。欧盟对于土耳其的这种做法持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态度,从宗教自由及民主的角度来看,这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原则;但欧盟确实又对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政党或者以政党为名的伊斯兰组织保持戒心,担心其通过民主手段颠覆世俗与民主的原则。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极端宗教势力通过选举上台便是例证。欧盟最初对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但随后欧盟发现该党只是一个具有温和政治动向且对欧盟示好的宗教政党,并非期待在土耳其废除世俗化或者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如该党一位领导人坦言曾反对土耳其入盟,认为欧盟对土耳其有太多偏见,“但是现在,尤其因普遍权利、人权、民主、自由、法治和财政自由之故,我不再这么认为”。^②正因如此,欧盟谴责了土耳其宪法法院2008年指控该党86位高官欲将土耳其伊斯兰化的起诉,明确指出这会影响到土耳其的入盟进程。^③

综合以上这两个层面的分析,所谓宗教因素中除了土耳其对于温和的宗教政党参与政治有限制甚至打压,对其入盟有着明确的负面影响之外,其余方面均不构成对其入盟的负面影响,甚至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伊斯兰教文明、文化属性只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欧盟国家的排斥,但不构成决定性因素。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欧盟成员国的政界人士和民众因中东穆斯林移民的增多、大大高于欧洲白人的出生率以及所引起的社会问题而对伊斯兰产生恐惧心理,如法国总统萨科齐2011年2月以二十国集团(G20)轮值国主席身份访问土耳其时曾明确反对土耳其入盟,其目的是吸引法国患有“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c)的右翼选票。^④也不可否认的是,穆斯林移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欧洲白人的分化,如有白人穆斯林参与的2007年伦敦地铁大爆炸,^⑤以及2011年7月一名挪威土生白人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前者并非反对欧洲的民主体制和穆斯林政策,而是反对英国政府的失衡中东政策,后者则是反对挪威工党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挪威相对宽容的穆斯林政策。^⑥这两者恰恰说明了无论是欧盟还是欧洲国家,都是提倡宗教与文明的多元化;欧洲内部存在的对伊斯兰教的恐惧并不等同于欧洲的重新宗教化。

曾任土耳其驻上海副总领事、土耳其总统首席中文翻译、纵横土耳其政商两界的诺扬·罗拿(Noyan Rona)先生指出:“土耳其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多党制、议会制的世俗国家”,“土耳其未入盟,欧盟在地球上的宏观实力不完整,不可能是全球性有分量的组织”,“宗教因素不构成对土耳其

① European People's Party, "Welcome to the EPP", <http://www.epp.eu/hoofdpagina.php?hoofdmenuID=1>.

② Effie Fokas, "The Islamic Movements and Turkey - EU Relations", in Mehmet Uğur and Nergis Canefe (eds.), *Turke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Accession Prospects and Issues*, Routledge, 2004, p. 154.

③ "Turkish Leaders Face Court Case", BBC News, March 31, 2008.

④ Nicholas Vinocur, "UPDATE 1 - Sarkozy Party: Islam Debate Undercuts Far-right", Reuters, April 5, 2011.

⑤ 相关表述来自土耳其诺扬·罗拿先生于2009年6月5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大讲堂”所作的“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作用与影响”的讲座。

⑥ 虽然挪威不是欧盟国家,但其完全符合欧盟成员国的标准,其政府加入欧盟的申请被全民公决所否决。

入盟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经济”。^①人们对于所谓宗教问题的过分关注而忽略了欧盟本身只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政治标准处于当前关于土耳其之争论的首要地位,但经济标准——对其报道之聚焦——也一定不能被遗漏”,“仔细考察欧盟关于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文件发现,其仍有巨大赤字”,“假若土耳其在此项艰难工作中,成功克服这些不足,它会在准备阶段结束时较好地提升其竞争力”。^②尽管2005年土耳其的公共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4%(之前为91%),但仍高于欧盟哥本哈根目标设定的60%,土耳其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欧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失业问题、贸易赤字和监管环境。^③将观察土耳其入盟进程的视野从所谓的宗教问题转向经济问题十分重要,经济问题才是土耳其入盟进程长期受阻的本质因素。也正如居尔·特金(Nihat Gültekin)和卡米尔·伊尔梅兹(Kamil Yilmaz)教授2005年所言:欧盟、土耳其之间的入盟谈判“将加快土耳其的进步,以便10年内在该地区取得政治与经济成功提供外部的方向和促动因素”,“随着最终的转型,当前欧盟内部关于土耳其成员国身份的经济缺失的争论将失去意义”。^④为了与欧盟哥本哈根经济标准相一致,土耳其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措施,如2003—2008年间面对各种抗议声所采取的大型私有化计划,这也带来了近400亿美元的收益。^⑤尽管2009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土耳其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土耳其自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实现经济的复苏。鉴于土耳其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土耳其将在2050年成为欧盟的第二大经济体,这能够使其他成员国摆脱周期性的衰退”。^⑥坚守世俗化和发展市场经济构成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两大动力。

Abstract The decades-long Turkey's accession to the EU has still been shrouded in the shadow, which contributes to a variety of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its rejection. With the revival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Islamic extremist violence marked by “9·11”, the religious conflict as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Islamic world, extend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urkey's accession process. Turkey and the EU reach a consensus on secularism and protection of personal religious beliefs, which in fact a positive factor in Turkey's accession, while they have disagreements on the political involvement of the moderate religious parties wh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and secularism. In general, rather than the so-called religious factor, the level of Turkish economy constitutes a main barrier for its accession.

(钮松 助理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200083)

(责任编辑:吴家多)

① 来自诺扬·罗拿先生于2009年6月5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大讲堂”所作的“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作用与影响”的讲座。

② Siegfried Schultz, “Turkey's Accession to the EU: Economic Criteria still out of Reach”, *Economic Bulletin*, vol. 40, no. 7, 2004.

③ Meral Varis, “The New Turkish Economy and EU Accession Talks”, no. 1, 2005,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2390>.

④ Nihat Bülent Gültekin and Kamil Yilmaz, “The Turkish Economy before the EU Accession Talks”, in Michael Lake (ed.), *The EU & Turkey: A Glittering Prize or A Millstone?*, Federal Trust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05, p. 61.

⑤ Terence Jackso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Ethics: A Critical,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67.

⑥ Lord Jones and Michael Wilson, *Fixing Britain: The Business of Reshaping Our Nation*,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1, p. 193.